

[回族伊斯兰教研究]

“中国经验”与全球清真寺发展路径选择

马丽蓉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上海 200083)

摘要: 在伊斯兰教由阿拉伯半岛逐渐向外传播的过程中, 也完成了区域宗教跃升为世界宗教的辉煌历程, 并以“随寺传播”的基本形式派生出不同的清真寺文化, 表明伊斯兰所特有的包容异己、不断进取的文化品格。中国清真寺文化是伊儒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 中国清真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全球清真寺发展极具参考价值, 但也面临着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关键词: 中国经验; 全球清真寺; 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 B9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86(2008)02-0111-05

一、中国清真寺发展的成功经验

公元610—632年, 先知穆罕默德历经22年的传教, 创建了以“乌玛”为核心的政教合一的穆斯林政权, 用伊斯兰信仰整合了半岛的部落意识, 伊斯兰教也成为阿拉伯民族的精神支柱。自632年以来, 伊斯兰世界通过不断的经商往来、文化交流、人口流动等多种途径而广泛传播伊斯兰文化, 伊斯兰教也由区域单一民族的宗教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多民族信仰的宗教。其中, 7世纪中期, 伊斯兰教通过海陆“丝绸之路”传入中国。10世纪后, 伊斯兰教在非洲、亚洲和东南亚的广泛传播多是通过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和圣门弟子的传教等实现的。自20世纪起, 又由穆斯林移民、劳工、商人和学者将伊斯兰教传入西欧和北美, 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与伊斯兰教由区域宗教跃为世界宗教相伴而生的则是世界各地清

真寺的不断出现, 并以“随寺传播”的基本形式派生出不同的清真寺文化, 表明伊斯兰所特有的包容异己、不断进取的文化品格。伊斯兰教自唐宋之际传入中国后, 来自阿拉伯、波斯的蕃客胡商便开始在广州、泉州、长安等地兴建了中国首批清真寺。中国清真寺文化就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成功融合的产物, 中国清真寺的成功发展即为明证, 其发展经验值得总结与借鉴,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中国清真寺不仅是进行“儒伊文明对话”的重要沟通平台, 也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对话文明范式的特殊纽带。

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 在普通穆斯林民众与穆斯林知识精英之间形成了“儒伊文明对话”的两个平台: 随着广州怀圣寺等首批中国清真寺的出现, 逐渐形成以清真寺阿洪为主讲者、礼拜殿为教室、《古兰经》和圣训为教材的经堂教育传统, 并在学习

收稿日期: 2007-03-18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研究项目06JJDGJW007及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项目资助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马丽蓉(1966—), 女(回族), 新疆乌鲁木齐人,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 博士, 教授, 《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

阿拉伯语和传播伊斯兰教义中实现了伊斯兰文明在宗教领域中国化的艰巨任务;推动伊斯兰文明在学术领域中国化的中坚力量则是一批既深谙儒学之道、又熟知伊斯兰文化的回儒,如刘智、王岱舆、马坚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民国时期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还掀起了一场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反思儒伊文明的关系,探索一种积极的文明对话行为。近年来,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积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尤其是“回儒对话”,大力倡导“对话”文明。在他看来,文明对话的先决条件是聆听和承认对方,通过对话来扩大自己的视野,加强反思反省能力,实现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他还特别强调宗教学界之间的对话,主张宗教学界应该发展出两种语言(两套话语),也就是两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宗教领袖应该有更为宽广的世界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积极致力于宗教界的对话文明。相比较而言,前一个对话平台是后一个对话平台的基础与保障,后一个对话平台是前一个的提高与升华。其中,清真寺与两个对话平台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物质或精神联系,也因此联系了穆斯林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自下而上、彼此关联的、居于体制内外的互补性的“儒伊文明对话”主体,形成既传播教义、又著书立说的中国式的对话文明范式。对此种对话文明范式的总结与梳理又对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明格局的形成极具参考性。作为同源异教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完全有可能在解决共同面临的地球问题中寻找共融与合作的空间,伊斯兰宗教领袖尤其应充分利用清真寺这一文化场域开展教内外对话:宣传和平、宽容的伊斯兰本质,抵制极端主义思想的渗透,妥善处理宣教与对话的关系,力争成为构建世界多元宗教版图与多元文明格局的建设力量。其实,中国清真寺的伊玛目(教长)素有在清真寺整理儒伊文化典籍而达“以儒释经”目的的学术传统,也有立足世情与国情的卧尔兹(宣讲)的布道传统,在清真寺实现了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的“儒伊文明对话”,完成了伊斯兰文明自下而上的中国化的历史使命。显然,清真寺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话文明实践中发挥了特殊纽带的作用,尤其是清真寺伊玛目的卧尔兹极富感染力,在挖掘和弘扬伊斯兰教义中的和谐思想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促进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加强各族穆斯林的沟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第二,中国清真寺不仅是弘扬“爱国爱教”传统的重要实践平台,也是穆斯林多重身份认同的整

合场。

在中国穆斯林“大分散、小聚居”的生存态势中,“围寺而居”成为穆斯林社区最鲜明特征之一。对于穆斯林这一信仰群体的管理,除国家管理体制的行政区划外,民间还存在一套自我运行体系,以解决俗权与教权分离的问题,亦即国家与民间双重管理体系作用于穆斯林社会。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的兴衰与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发展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中国著名清真寺的发展历史又往往成为不同时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某种折射,如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杭州凤凰寺、北京牛街礼拜寺、西安化觉巷清真寺、临夏南关清真寺、兰州西关清真寺、银川南关清真寺、宁夏同心清真寺、西宁东关清真寺以及新疆喀什的艾提卡尔清真寺等均如此。因此,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国穆斯林深知国兴则族兴、族兴则教存、教存则寺在的历史发展规律,尤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马本斋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高举“爱国爱教”的伟大旗帜,与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敌殊死搏斗,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不仅如此,在陕西和四川等革命根据地还出现了红色清真寺,为新中国的建立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毋庸置疑,中国穆斯林也存在着协调多重身份的自我认同问题,但因“爱国爱教”传统和“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再加上伊斯兰教的“两世吉庆”理念和“爱国即爱教”的经训思想,中国穆斯林大多借助清真寺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场域既弘扬了“爱国爱教”传统,又完成了多重身份的协调与整合,成为一群有信仰的中国人,并成为儒伊文明成功融合的重要产物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美欧穆斯林移民问题的日益凸现,“9·11”后更如此^[1]。从某种意义上看,美欧之所以出现穆斯林移民问题,原因固然复杂多样,但恐怕更折射出伊斯兰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相互疏离、彼此猜忌甚至敌意的历史积怨与现实处境。特别是在“9·11”后美欧穆斯林成了“问题移民”,在全球宗教复兴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开始聚集在伊斯兰教旗帜下,力图从宗教符号中获得身份认同,宗教归属成为身份认同的标记,出现了美欧穆斯林移民“重返清真寺”现象,成为其身份认同的一种外显。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穆斯林移民问题在欧洲格外突出,相当一部分欧洲人公开抵制伊斯兰宗教符号,如反对戴头巾和修建清真寺,甚至认为清真寺的宣礼塔都是一种文化的示威。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强调,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只有在确定了

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之后,才能够表述行为体的行为。“重返清真寺”的美欧穆斯林移民并未彻底解决自我身份危机,或将清真寺视为缓解社会压力与生存困境的“避风港”(大多数人),或将清真寺作为反对美欧不公平中东政策的宣泄场(少数人),伦敦连环大爆炸后出现的美欧本土圣战者也是美欧穆斯林移民问题的派生物之一,美欧清真寺也因此成为美英等国警方怀疑与严查的重要场所。显然,清真寺在穆斯林身份建构中发挥了提供精神归宿与物质庇护的双重作用,中国清真寺更因“爱国爱教”传统的弘扬与实践而使穆斯林成功确立了自我身份,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第三,中国清真寺不仅坚持“以寺养寺”的独立生存原则,还成为融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探索者。

伊斯兰著名经济学家阿卜杜·哈南教授在1982年为世界伊斯兰银行职员培训班开设伊斯兰经济学课程时,依据《古兰经》和圣训,并引证大量历史数据,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伊斯兰经济的基本原理,强调伊斯兰以社会公正与互助为目标的经济思想,例如禁止利息剥削和强行课税,尊重个人的自由和志愿如则卡特制度和生产经营,关心弱势群体如孤寡病老和贫困户,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鼓励生产和物质交流反对破坏性暴殄天物,在一切经济领域中特别强调伊斯兰的哈俩利与赫拉姆道德界限。伊斯兰国家的政府、民间慈善团体和清真寺,都有力所能及的扶贫和慈善规划,帮助国内外的穆斯林弟兄。扶贫和慈善是伊斯兰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志愿课税制度主要是在清真寺组织实施的,多用在社会扶贫和帮助提高弱势群体生活能力等方面,体现了伊斯兰的社会公正与利益均衡^①。因为,真主的恩典要降赐给那些在“大地上受欺负的人”(28:5—6)^[2]。中国清真寺坚持“以寺养寺”的独立生存原则,寺院经济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独特作用和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清真寺为城乡经济繁荣、调动穆斯林群众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经济收入与支出也因广大穆斯林群众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长。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建设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而经济全球化也加速了商品、服务及资本等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在此冲击面前,我国清真寺如何既能遵循“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又能在“以寺养寺”中获得发展并有机融入国家经济建设,这是中国清真寺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党

和政府在新时期提出的更高目标。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同时,“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但是,如何能使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变革相适应,伊斯兰经济又如何才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协调,这些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在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只能在发展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中国清真寺一直是融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探索者,寺院经济活动及其发展模式,不仅为伊斯兰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案例,还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形式的丰富、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均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尤其是依托清真寺所开展各类慈善公益事业已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均衡提供了直接的服务,如关爱弱势群体、因地制宜地开展公益活动等,都有助于整合利益结构,化解社会矛盾,并协调社会关系。

也正是由于中国清真寺在其数千年发展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尤其是“爱国爱教”与“以寺养寺”解决了穆斯林的精神归属与生存基础等重大而切实的问题,并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形成了中国清真寺的基本发展模式。

二、中国清真寺发展的现实挑战

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是一个“包含着特殊性的普遍化和普遍性的特殊化的双重过程”,国际社会出现一体化和碎片化的双重趋势,这就为解决不断涌现的全球性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化既非同质化,亦非西方化,而是人类面临问题和未来命运日趋共生化,各国关系渐密切且利益复杂交织;全球化也是一种富有活力的社会力量,具有影响世界但同时也被世界不同文化传统所塑造的双重作用。因此,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全球化主张,并明确了具体因应目标:政治上,共同推进国际关系向民主、协作、和睦等方向发展;经济上,共同推进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安全上,加强互信与合作,坚持用和平而非武力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环保上,互助与协作,共同呵护地球家园。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政治资源,宗教在全球化进程中地位日显,西方学者提出了“宗教与全球化”的命

题,思考不同宗教文化如何在“和而不同”中实现共存的现实问题。同样,中国伊斯兰教在中国全球化进程中应该、怎样、实际情状如何等都直接关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因此,如何使伊斯兰这一文化软因子成为实现“和谐中国”的积极力量则是中国清真寺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清真寺面临着如何发掘和利用中国民间外交文化资源以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挑战。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包括国家形象在内的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任何一项政策都是在国家利益基础上进行损益评估的结果,而国家利益就包括美誉度和国际形象。为此,在塑造“和谐中国”的国际形象时,除继续加强政府行为体的对外宣传外,还应加强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特别是在处理中阿关系时,既要继续贯彻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还应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亦即:中国应借助中东大舞台来构建“和谐中国”形象,在中东热点问题的处理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为拓展中国软实力发展寻找新的突破口。中国清真寺要想在发掘和利用中国民间外交资源上有所作为,恐怕首先就得积极协助地方伊协抓好朝觐工作,逐步提高朝觐穆斯林的整体文化素质,组织政界、商界、学界、传媒等穆斯林精英去沙特朝觐,借机与伊斯兰世界开展全面交流与合作,并借朝觐这一特殊宗教礼仪情景从务实和务虚两方面积极推介“和谐中国”形象,在充分发掘宗教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密切中阿特殊外交情谊,积极回应沙特等海湾国家“向东看”的对外新战略,逐步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第二,中国清真寺面临如何抵制“疆独势力”蓄意渗透“基地”意识以维护国家非传统安全的挑战。

不可否认,巴基斯坦的“红色清真寺风波”既冲击了巴境内的社会稳定,又影响了巴在国际上的形象与声誉。若将此次事件“所暴露出的极端主义问题加以解剖,则其中最关键的三大问题是圣战问题、经文学校问题和部落问题。目前,‘红色清真寺’危机虽暂时平息,但这一事件却折射出当前巴基斯坦极端主义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3]。巴基斯坦极端主义问题甚至出现“外溢”趋势,尤其是打着“圣战”旗号来反西方、以色列、亲美政府甚至世俗政府的“新圣战文化”被“疆独”分子利用后,他们竭力向在清真寺礼拜的中国穆斯林加以兜售和宣传,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清真寺就面临着抵制“基地”意识

渗透以维护国家非传统安全的严峻挑战。因此,我国政府应积极引导中国清真寺管理机构与中东清真寺温和派伊玛目加强民间往来与沟通,以拓展特殊形式的反恐合作空间。目前,中国面临着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以及宗教极端势力等“三股势力”的威胁,西方一些媒体又打着“人权”、“民族”和“宗教”等幌子竭力将“北京奥运政治化”,欲借歪曲中国的宗教形象来诋毁“和谐中国”。因此,中国清真寺在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独立自主自办以及政教分离”等原则的前提下,也肩负着维护国家非传统安全的特殊使命与社会责任。

第三,中国清真寺面临如何应对外籍穆斯林身份重构的挑战。

清真寺是伊斯兰世界最突出的地表建筑、最永恒的人文精神象征和最基本的宗教和社会生活场域。“如果从它的外在形式上看,它代表着伊斯兰教建筑的独特风貌,体现着一种伊斯兰教建筑的独特神韵,从内在内容上看,它确实构成伊斯兰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融伊斯兰教的宗教、艺术、建筑为一体。它为穆斯林在场言说提供了平台,而穆斯林在清真寺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从而标志着穆斯林自身的身份或位格,使它们在现世的载体与自我得以统一,消除了红尘世间迷失自我或丧失自我的可能性。”^[4]换言之,清真寺这一文化场域是在不断满足穆斯林个体在物质和精神双重纬度上的归属诉求的过程中,几乎同步地完成了穆斯林的自我身份构建。因此,“穆斯林不能没有它,它也不能离开穆斯林,一旦穆斯林弃它而去,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穆斯林也就成为无家可归者,所以伊斯兰信仰把穆斯林与清真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4]。自622年先知穆罕默德被迫迁往麦地那成为“迁士”起就诞生了实际意义上的首批穆斯林移民,而这批穆斯林围寺而居他乡的生存方式又一直影响着后代穆斯林移民社区的建立,并累积形成穆斯林移民的“追寺情怀”。面对全球范围的穆斯林移民潮,我国义乌等沿海开放城市中的清真寺也面临着外籍穆斯林身份重构的现实挑战,亦即,清真寺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场域资源优势,积极而有效地协助政府引导来华穆斯林尽快融入国家经济建设,以帮助外籍穆斯林在新环境中重构自我认同。

总之,将清真寺的发展问题置于我国构建内外和谐的大战略与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新格局中来定位和研究,力争使中国穆斯林成为我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一支积极力量。

三、全球清真寺发展的路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快, 宗教的国际性日益突出, 有数以万计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形成了跨国性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倡议网络, 特别是鉴于“9·11”后宗教多与国际政治冲突相纠葛的现实, 宗教非政府组织利用自身的组织资源和公共平台, 展开宗教间对话, 在求同存异中起到抑制极端主义维护世界安全与稳定的作用, 体现出全球治理体系中多重治理的价值观, 促进了全球治理的有效性、规范性、广泛性和民主性。但是, 也出现了不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传播, 其活动的内容、过程、拓展方式以及对经济社会结构产生的冲击, 已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审慎关注。

尽管清真寺组织在开放性与透明度上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 但在美欧各大城市已出现了以清真寺为依托的伊斯兰文化中心, 针对伊斯兰世界存在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 召集清真寺的集体祈祷, 力促世界穆斯林大会形成解决问题的决议, 直接参与调解、谈判和解救人质, 开展慈善救济与国

际人道援助等; 积极投身穆斯林移民社会的各类公益事业, 尤其在穆斯林移民的外语、计算机等职业技能培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凸显出社会多重服务功能; 实施“走出去宣教”策略, 与其他宗教组织进行对话和交流, 不定期举办“清真寺开放日”, 正面宣传伊斯兰教,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伊斯兰教的神秘色彩, 有助于澄清西方媒体对伊斯兰教的歪曲性炒作, 有利于形成清真寺内外的沟通与和谐……这是美欧清真寺发展中出现的可喜势头, 其成功与否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因此, 在积极管理与有效利用的前提下, 可充分利用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宗教国际性和非政府组织跨国性等自身的资源优势, 依托清真寺形成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非政府组织。这, 不仅是伊斯兰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 也是伊斯兰因应“宗教与全球化”这一挑战的可行性举措。其中, 增强沟通功能、回归宗教本性、奉献人道情怀等将是全球清真寺发展路径选择的基本准则。而这些又是基于中东清真寺发展的现实挑战、美欧清真寺发展的新势头尤其是中国清真寺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学理性预判, 前景值得期许。

注释:

①见 <http://www.china774.com/Article/read.asp?id=284>

参考文献:

- [1] 马丽蓉. “9·11”后的美欧清真寺与穆斯林移民问题 [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8, (1).
[2] 马坚译. 古兰经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3] 傅小强. 穆沙拉夫, 他打赢了吗? [J]. 世界知识, 2007, (15).
[4] 吴彩梅, 马俊峰. 有限空间的无限言说 [J]. 西北民族研究, 2006, (2).

责任编辑: 一 凡